

一 冷战

——美国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

进入 20 世纪的下半叶，经受两次世界大战风雨摧残的各国人民本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静享和平，休养生息，在战场的废墟上重建美好的家园，在美好的家园中抚平心灵的创伤。殊料，人间世事的沧桑变迁并不总是以善良人们的良好意愿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更是折射出“胜者王侯败者寇”这一残酷无情的“丛林法则”。对此，没有谁比二战最大赢家——美国更明白无误、清楚无疑了。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美国，不仅毫发未损，反而因祸得福，一跃而成全球性大国。其实力空前增强，野心也随之急剧膨胀，意欲充当擎天巨神，一手托起重建环球新秩序的重任。当时，在美国一位名叫塔德·舒尔茨的新闻记者曾这样形容美国的“独领风骚”和“意气风发”，他说：“当和平重新来临时，美国已万事俱备：强大的工业，自给有余的农业，完善的教育体系，社会与政治稳定，强大无比的军事力量，以及无限的乐观精神。……美国已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经济巨人和各国希望的中心。”

的确，当时美国之强盛可谓“如日中天”、“睥睨群雄”，其统治世界欲望之强烈更是“激情澎湃”，认为 20 世纪应成为“美

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美国世纪”；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目前我们，而且只有我们，掌握着原子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政策强加于全世界”。

但是，事情并非这般顺畅。美国的这一“雄心壮志”刚“呼之欲出”，就差点中途搁浅，因为它遇到了巨大的路障，这就是正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最为强劲敌人就是战时的盟友——苏联。尽管苏联在二战中比美国付出了更为高昂的代价和牺牲，但却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顽强地茁壮成长起来。它不仅军事实力与美旗鼓相当，政治力量与美平起平坐，“二者似乎都在天意的安排下各自支配着半个地球的命运”构成新的权力天平的两极”而且拥有感召力极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使当时的世界许多国家为之倾心和仰慕。

一时，世界形势在急剧左转，美苏间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尖锐对立。其实，这一对立早在 1917 年世界上第一个新生苏维埃政权在茫茫的俄罗斯大地上诞生后即已开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策划如何将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如果不是因为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暂时掩盖了美苏间意识形态分歧，使得它们别无选择地携手共战，成为共同抵抗法西斯的战时盟友，或许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敌我较量早就开始了。

随着二战的结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立更显得不可调和：前者无比珍视个人主义，奉行市场经济，推广民主自由；后者则强调集体主义，采取计划经济，推行阶级统治。这种尖锐对立普遍存在于各自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

观念等所有领域，而最让美国难以忍受和极为恐惧的是，苏联不仅声称自己的模式最为完美和理想，而且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誓言要用“革命”的方式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这无疑对美是大逆不道的“异端邪教”、来势汹汹的“洪水猛兽”、狰狞可怕的“恶魔幽灵”，发动一场“新十字军东征”势在必然，迫在眉睫。

（一）长电报，， ——X 先生点起冷战第一把火

何谓冷战？顾名思义，它是与“热战”相对而言的。既然是“战”，何以又“冷”？意指它不像“热战”那样真刀实枪、硝烟弥漫，打得不可开交，而是指枪炮已经上膛却未冒烟，炸弹已经定向却未引爆；人们似乎看不见刀光剑影，但却能听得到磨刀霍霍，感受到它比“热战”更扣人心弦，更惊心动魄，不能预知它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演变成“热战”，就像决战前的战场虽是一片宁静，却潜伏着激战爆发前的骚动与不安。

那么到底是谁发明了“冷战”这个词？据考证是美国一位名叫赫伯特·斯沃普的政论家。他在1946年初为美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了一篇演说稿，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冷战”一词，称“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不过未引起太多的公众和舆论的注意。到了1947年，赫赫有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冷战》，畅销一时，“冷战”一词得以传开。但是，真正点燃“冷战”第一把火的，却是乔治·凯南这样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1. “凯南长电报”出笼

乔治·凯南，生于 1904 年 2 月 16 日，1921~1925 年间就读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专攻近代欧洲史，毕业后投身外交界，成为美国职业外交官中“第一批受专门训练的俄国问题专家”，长期在美驻苏大使馆任职，从三秘一步一步地爬至二秘、公使衔参赞和代办，就像所有的职业外交官一样常年在异国他乡苦熬资历。

不过，凯南又有所不同，其过人之处在于他在为日常琐碎的外交事务所累的同时，却酷爱钻研和思索“更加深奥”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历史知识，尤其是对新兴苏联的发迹很有兴趣。他不仅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在任职期间跑遍了苏联大地，早在二战爆发前就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苏联的看法和认识，最敏锐的一点就是认为美苏终有一日必将对立。

令他失意的是，他的这种对苏认识在当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为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奉行的是对苏友好合作的政策，而且习惯于撇开国务院和职业外交官来处理对外关系，因此凯南长期坐冷板凳，不为重用。他发回来的大量报告也都被华盛顿高层束之高阁，形同废纸。如果不是一件偶然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心灰意冷的凯南恐怕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打发日子，坐等告老还乡的那一天了。

1946 年 2 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得知苏联有意不参加美一手操办起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电驻苏使馆让他们弄清缘由。当时的驻苏大使哈里曼已辞职回国，使馆日常工作正由代办凯南主持，这项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头上。不过，在凯南看来，苏联此举一点也不奇怪，令他奇怪的是华盛顿那边居

然对此不得其解，说明政府高层尚未完全认清苏联的行为动机，仍不切实际地幻想美苏能继续合作。

为使华盛顿大大小小的头脑们彻底明白过来，凯南认为有必要对苏联作一番“外科手术式”的剖析，哪怕长篇大论也在所不惜，绝对不能只是就事论事，交差了事。此时正抱病在床的凯南，经过认真的思索，在两个秘书的记录下口授了一份电报，对战后苏联的“意图、理论、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应采取的对策洋洋洒洒地说了 8000 字，并于 1946 年 2 月 22 日发回美国国务院。

为了便于发送和接收，“长电报”依次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它们是：（1）苏联战后世界观的基本特点；（2）这一世界观的背景；（3）在官方政策上的表现；（4）在非官方政策上的表现；（5）这一切对美国的意义。每一部分都独立成章，但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算得上是一环紧扣一环，文字流畅，观点鲜明，充分展示了凯南多年来所积累的对苏联的历史知识以及理论功底，其语调全然不似通常外交公文那般平淡拘谨，倒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架势。

“长电报”认为，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其传统不安全感的产物。苏联始终感到它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生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消除这一固有不安全感正是苏联的行为动机。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则是为消除天生的不安全感、在国内维持“独裁制度”、在国外扩张势力范围提供的理论依据和斗争工具。为此，美国首先是要理解苏联政权的行为实质，并让公众了解真实情况，把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在“现实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其次是保持“自己社会的健康和活力”，拥有足够武力并准备使用武力，以“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区和政治问题上既严肃又巧妙地同它组织对

抗”使之解体或逐步软化。

尽管“长电报”是用密码发回，并被美国国务院列为绝密文件，但一向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很快即获知其主要内容，并在《时代》周刊上率先加以披露。消息一发出来，立刻在美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猜测这份电报将对未来的美苏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国务院对此电报更是“异乎寻常”地重视，很快将它上报高层，引起高层政要的一片赞誉；国务卿贝尔纳斯称电报的分析“十分精彩”；驻苏大使哈里曼亲自致电“谨致庆贺”；一直主张对苏强硬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更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将它复制多份供军中几百名高级将领作为必读文件阅读。

的确，凯南这一电报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恰好迎合了当时杜鲁门政府有意改变对苏政策的需要，对美举国上下统一对苏认识起了思想导向的作用，为美即将采取的“遏制”政策提供了“完美的逻辑依据”。因此大多数史学家都把它视为美国战后对苏联意图最早、最全面的估计以及后来的“遏制”战略出台的理论根源。凯南本人也因此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春风得意，奉旨回国，出任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负责制订对外战略，挤入了决策圈，权倾一时。

2. “杜鲁门主义”问世

杜鲁门是在 1945 年 4 月 12 日因罗斯福总统脑溢血去世而匆忙接任美国总统要职的。在此之前，这位“从密苏里来的矮小的人”，虽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但有名无实，并未真正受到罗斯福的另眼相待，更不是罗斯福中意的接班人选，只不过由于党内争斗，罗斯福才不得不立他为副总统，作为权宜之计。

与美国有史以来惟一 4 次连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相比，出身低微、未受过高深教育、完全靠自我奋斗出人头地的杜鲁门，不仅没有罗斯福出自名门所具备的优雅风度、丰富学识与深厚修养，而且也缺乏罗斯福治国的老谋深算和“雄才大略”。因此，当时国内许多人，甚至包括杜鲁门的亲密朋友，都对他不那么看好，认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如果他能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安度过 4 年任期就已是不错的结局了。

倒是英国的丘吉尔这位政坛老将眼光不凡，一眼便看出初出茅庐但却不甘平庸的杜鲁门不仅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试与罗斯福比高低的倔强劲，而且在反苏反共的欲望上更是与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在 1945 年 5 月的一天，他给杜鲁门发去了一封“铁幕电报”，称：“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层铁幕垂在它的防线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特里雅斯特—科孚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如果俄国人在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洋海岸，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达到目的。”

在这封电报里，丘吉尔以英国人惯有的那种含蓄，欲说还休般地暗示杜鲁门应该察觉到苏联正在变得多么可怕。对此，杜鲁门深以为然，认为丘吉尔的话正是他想说却又不便说的，并且启发了他让“老将出马”，打打前阵，“利用英帝国日趋没落而恐惧苏联的心理，在国际上进一步散播反苏烟幕”的想法。于是，杜鲁门向丘吉尔发去回电：一是表示感激，二是郑重其事地邀请他来美访问。已经赋闲在家却耐不住寂寞的丘吉尔自然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杜鲁门的邀请。

1946 年 3 月 5 日，在杜鲁门的亲自陪同下，丘吉尔来到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富尔敦市的西敏斯特学院，慷慨激昂地发表

了题目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一向颇具演讲才能的丘吉尔此次更是竭尽所能：他首先危言耸听地向听众描述了一幅令人生畏的画面，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

接着，丘吉尔不惜屈尊，对美国大加吹捧说：“美国此刻正高居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最后，他大声疾呼，英美两国应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铁幕演说”。它率先吹响了冷战的号角，并煽动起当时美国内民众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恐惧，感到“自由受到了一个新的而且更危险的敌人的威胁”。这也正是杜鲁门所要达到的一种戏剧效果，以便其日后顺利推出对苏“遏制”政策；毕竟罗斯福长期奉行的对苏合作政策在国内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

一年后的 3 月 12 日，杜鲁门总统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自上阵，在美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厅发表冷战总动员令。他面容严峻，慷慨陈词：“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人身、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

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

杜鲁门的这一讲话无疑是给即将到来的美苏冷战定了调，且用语刻意夸张刺激，以求制造出一种强烈的反共效应，调动起民众激进的反苏情绪，散布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紧张气氛。果不出他所料。当杜鲁门讲完后，到会的两党议员难得地一致起立，欢呼鼓掌，情绪激昂。各大报纸、电台也纷纷刊载杜鲁门的这一讲话，并给它冠上“杜鲁门主义”的美称，认为这是杜鲁门以美国总统之尊，把早已成竹在胸的“遏制”战略作为基本国策第一次公之于众，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

1947年7月，为给“杜鲁门主义”造势，美专门探讨外交政策的赫赫有名的《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一篇署名为“X”的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建议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但同时又是坚定和警惕地对苏联扩张主义倾向加以遏制”，以促进苏联朝着“要么打碎苏维埃权力，要么使它逐渐软化”的倾向发展。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普遍认为它带有官方背景，是美政府将要调整对苏政策的重大信号。

7月8日，美著名记者阿瑟·克鲁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题为《官方对俄国看法之指南》，暗示这位“X”先生就是凯南本人。舆论界一片哗然，“顿时，它很快成了名副其实的宣传漩涡的中心。《生活》周刊和《读者文摘》发表了长篇摘要。‘遏制’一词经新闻界的一致同意，被挑了出来并被捧上了‘主义’的地位，把它和当时政府的外交政策等同起来”。

不过，这类炒作一直遭到凯南本人的否认，直至晚年他回忆起这篇文章，仍一再强调它并非是官方的授意之作，而是他本人的学术之见，且人们对他这篇文章的理解也有偏误。但是，鉴于他当时的官方身份、文章发表的时机及其实质内容，相信他这一说法的人并不多。时至今日人们仍普遍认为，它是在为“杜鲁门

主义”提出理论根据。即使他本人在当时不是主观想要配合“杜鲁门主义”的正式出台，但在客观上仍然起到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称凯南为“遏制之父”或“遏制设计师”恰如其分，并不像凯南本人“自谦”的那样只“对华盛顿的官方政策起微不足道的影响作用”。

3. “冷战”纲领确定

由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条件均已成熟，将“遏制”战略作为美发动冷战的总纲领，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48 年 11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编号为 NSC20/4 的绝密文件，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苏联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心理战具有危险的潜力，除非美国或其他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足够的抵制，否则它足以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并打乱它的传统机构。与苏联开战的危险已足以有理由使美国按照常情采取有备无患的措施。”

1950 年 1 月 31 日，继凯南之后的新一代遏制政策设计师保罗·尼采主持起草了《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纲要》的文件（编号为 NSC68），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多极均势得以维持的局面已经改变。一方面，国际权势越来越集中在美苏这两个对立的大国手中；另一方面，苏联“由一种同我们自己信念相反的狂热信仰激励，企图把自己的绝对权威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此种局面，加上核战争风险，使美国在处于力量发展巅峰的同时，陷入最深重的危险之中。为此，美必须“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该文件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提出了 7 点重要建议：一是反对与苏联谈判；二是发展氢弹，以抵消苏联到 1954 年可能实际拥有的原子武库的威胁；三是迅速建设常规军队，以维护美国利益而不必进行原子战争；四是大力增加税收，以支付扩大常规军队的费用；五是对美国社会进行动员，使美国人民在做出牺牲和团结方面保持一致；六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同盟体系；七是从苏联内部破坏其制度，主要是进行心战攻势。

1950 年 9 月 30 日，杜鲁门亲自主持白宫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正式通过把 NSC68 文件的结论作为今后四五年内要执行的政策的声明，并由总统正式批准尽快执行。同年 12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68/3 号文件正式出台，从军事、外援、民防、储备、对外宣传、国外情报及内部安全等 7 个方面，对美安全目标和对策提出了一系列详尽的方案，要求各政府部门必须遵照执行。

至此，美国的“冷战”战略纲领已定，并毫不迟疑地付诸实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创立北约军事同盟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团结在它的旗帜下，走上冷战的不归之路。在东方，苏联也不甘示弱，接受挑战，拼凑出一个“经互会”和华约军事同盟与美国对峙。冷战铁幕终于降下了。

（二）在亚洲开辟冷战第二战场

应该说，冷战首先是在欧洲全面展开的。在那里东西方两大阵营重兵对峙，壁垒森严，欧洲是美“遏制”战略的重点。但

是，美一刻也没忘记处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时在冥思苦想如何将辽阔的亚非拉地区纳入冷战轨道。其中，亚洲被美视为首选对象。因为美已迫切感到，在那里，以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如不赶紧加以扑灭，不久的将来广阔的太平洋就会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这样，刚从二战血雨腥风中艰难跋涉出来的亚太各国和人民，尚未来得及扬眉吐气，直起腰杆，又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东亚冷战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而美国的东亚冷战之舟也注定将是命运多舛，前途坎坷，仿佛一叶孤舟在波涛翻滚的大海中颠簸起伏，随波逐浪，难以把握自己前行的航向，甚至还会面临灭顶之灾。美势必要陷入东亚冷战的泥沼之中。

1. 政策转向

当二战刚刚结束之时，美在亚洲的地位可以说得上是空前的有利，用“独霸”来形容也算不上过分。它通过单独占领日本，形成了将太平洋变成了自己“内湖”之势；通过扶植中国国民党政权，使得东亚大陆的主要部分呈现出亲美气象；通过支持英法等国所属亚洲殖民地上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得英法等国在亚洲的影响日渐衰微。

尽管苏联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张，中国共产党也欲在中原大地与国民党一决胜负，但美仍然信心十足，非常乐观地认为：只要自己全力保住亲美的国民党政权，只要自己牢牢地控制住日本这只已穷途末路的困兽，只要自己对其他亚洲小国略施“小惠”好好安抚，清除苏联的影响，遏制“赤色”扩张、保持自己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并不太困难。

然而，最理所当然的事情却最难实现。美万万没有想到中国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虽然有“飞机加大炮”却在不到 3 年的时间内败给只有“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的共产党，使其多年来扶蒋反共的投资血本无归。“丢失中国”无疑是对美东亚冷战的当头一棒，更是对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远东格局的巨大震动。美国不得不意识到“亚洲又成为冷战的一个主要地区，就像欧洲和中东一样，需要以一个全面的战略来对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 年 12 月 23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国家安全委员会 48/1 号文件）静静地摆在了杜鲁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桌上，引起了杜鲁门的高度重视，并下决心对其亚洲政策来个 180 度的大转向。文件认为：东亚正处于大动乱的阵痛之中，这为共产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和有利条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使美国面临在亚洲大陆丧失任何立足点的危险，并加强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优势。因此，美在东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进一步蚕食”，“逐渐削弱和最终消灭苏联在亚洲的优势，直到苏联不能从这个地区威胁美国及其友邦的安全。”

这一结论无疑为未来的美亚洲政策定下基调，这就是要在亚洲迅速开辟冷战第二战场，且要以遏制中国为核心全面展开。考虑到自身资源和能力有限，如何有效分配其国力与资源，既保证欧洲这一战略重点又能兼顾亚洲，美政府内部的重欧派与亲亚派之间曾出现分歧，最后双方各做一定的妥协，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在美苏“热战”的情况下，美国将“在西方实行战略进攻，在东方实行战略防御”，以最低限度的军事人力和物资确保东方实行战略防御成功，以便把主要力量投入西方。

但是，具体在东方的哪里划出一条明确而又合适的战略防御线，美决策层则颇费了一番心思。几经“沙盘推敲”，终于画出

了两条基本的遏制线：一是西太平洋的“防御环带”，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这一线的防务责任由美直接承担；二是亚洲大陆东部中苏外围，主要包括韩国和东南亚，这一线的防务，则依靠经过选择的非共产党国家对“共产主义侵略和颠覆”的抵抗，美主要提供各种援助。这一战略防线的确立促使美亚太战略的依靠重点从中国移向日本，采取了“围堵”中国和“扶植日本”的政策。

2. “围堵”中国

当杜鲁门主义特别是马歇尔计划在西欧得逞于一时之际，美在东亚的冷战一开始就出现了败笔，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失去 960 万平方公里的反共前沿基地，使得苏联的“亚洲势力范围”一下子向南推进了几千公里。美不得不退出在东亚大陆上的冷战主战场，只得在大陆外围重新构筑起一道遏制线。

本来，美一直设想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亲美、统一”的国家，使之成为美在亚洲及西太平洋地区的中坚力量和可靠盟友，“充当阻止苏联在东北亚的可能的扩张的缓冲地带”。但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不得不认定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大步迈进，红色中国已成为亚洲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美国在远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与苏联紧密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侵略性的中国共产政权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威胁”，“中国牌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的共产主义更危险”。

这种对华认识导致美改弦更张，将其对华政策目标从“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变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决定“放弃”中国大陆而集中力量“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

手”，防止中共的影响扩大到中国大陆之外。具体的办法就是尽最大可能遏制与孤立中国。为此，美不仅积极拼凑反共反华军事联盟，大搞“战争边缘政策”，挥舞原子弹对中国实行核讹诈，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实行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而且还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制造中苏分裂或促使中国政权垮台。

最不遗余力的则是放蒋出笼。本来，龟缩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物质短缺，人心低落，政局混乱，外交孤立，而且连一贯支持它的美国也不抱信心，“袖手旁观”，甚至一度想扶植“台独”分子分离台湾，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由联合国托管，以求“脱身”。由于美东亚政策突然转向，“围堵”中国成为重中之重，原本一落千丈的台湾对美冷战战略价值陡然上升 这就是：“虽然我们并不需要台湾作为我们的基地……但台湾落入一个潜在的对手手中，从战略上讲必定是极为严重的。这就是说，如果中共取得了台湾，俄国就会在那里建立基地，从而威胁我们在太平洋的从日本、冲绳至菲律宾的整个生命线。”

反共老将麦克阿瑟更是连续两次向华盛顿提出关于台湾战略意义的备忘录，声称台湾是美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一旦美苏爆发战争，台湾对于共产党来说就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站，其位置对于苏联完成其战略十分理想，同时还可以把美国远东部队在（西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反攻能力彻底消灭。”

于是，不能抛弃台湾成为美政界共识，这就给正走投无路、惶惶不可终日的蒋家王朝以苟延残喘之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立即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并立即向台湾提

供各类军事援助及装备，派遣军事考察团前往训练国民党军队，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将维持并发展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缔约国的领土”遭到“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这样，在美“以台制华”的伞翼下，蒋家王朝得以维持下来。

3. 扶持日本

二战刚结束时，美对日政策意图非常简单，重点在于彻底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将一种“歼灭性和平”强加于日本，使其不能东山再起，永远臣服。然而，来自苏、中共主义“扩张的威胁”使美放弃了进一步惩罚或教训日本人的想法。因为一个被永久摧垮的日本只会加强中、苏在亚太地区的势力，相反，如果能发挥日本的地理牵制作用，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控制了日本，既可有效地封锁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海参崴港口，又可使中国东部沿海经济繁荣地区处于美军直接攻击之下，从而在远东牵制住美“意识形态对手”的大量武装力量，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

这一“以邻制邻”的设想是可行的。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劲敌”与“克星”，而现实中日本已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为了生存，它也只有选择听命于美国这一出路。当时美对日政策主要设计师乔治·凯南就有着浓厚的重日轻华的倾向。他说：“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我们美国人会感到相当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则更糟。然而共产主

义在中国的大部分胜利必然增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他主持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于 1948 年 3 月 25 日正式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政策文件，主张美对日政策应从战后初期“惩罚性”步骤转变到扶植日本方向上，使日本成为西太平洋的独立力量，避免受共产主义的渗透与控制，构成美国保卫自身战略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基于此，美对日政策做出了诸如减少和取消日本的赔偿、放宽和取消对日本财阀的限制、加速扶植日本经济复兴、整肃对象从日本右派转向左派、重新武装日本以及对日片面媾和等重大政策调整。

以凯南报告为蓝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分别于 1948 年 10 月、1949 年 5 月通过了第 13/2、第 13/3 号文件，正式完成了对日政策的重大转变。这些文件连同以后日美两国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以及《日美行政协定》，名正言顺地将日本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一时，日本在美舆论中也赞誉声起，被盛赞为亚太“防共的坚定堡垒”，世界“冷战的前哨”，美亚太“沿岸岛屿防御链”中的“超级多米诺骨牌”。

4. 编织反共链条

战后美国在全球的扩张与历史上的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有所不同。它不是一味地单枪匹马地蛮干，而更多地借用某种“合力”，在世界各地通过军事同盟和安全条约等“法律”形式，精心延伸和加固其力量的支撑点，精心布下包围其对手的“天罗地网”，使其挣扎不能，动弹不得。